

博导文丛·文献学研究系列

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

周国林 著

岳麓书社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文献学理论，回顾20世纪文献学的发展历程，对历史文献学理论中的若干问题略抒己见。

第二部分重点总结张舜徽先生的国学成就和贡献，并探讨其治学观和治学方法。

第三部分是对《三国志》等典籍的文献学研究，对史学理论和出土文献考证也有所涉及。

第四部分收录了若干种古籍校点、注译的前言，对所整理古籍的内容和价值有较深入的论述。

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

周国林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周国林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7-80761-210-0

I. 文... II. 周... III. ①古籍—中国—文集

②文献学—中国—文集③文献学—学者—人物

研究—中国 IV. G256-53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4091 号

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

作 者:周国林

责任编辑:曾 倩

封面设计:萧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2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80761-210-0/G·714

定价:24.00 元

承印: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自 序

屈指算来,从事历史文献学的研习已经三十年了。时光如流,青春不再。论文选编之际,回首往事,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1979年,我从拉萨考回母校华中师范学院,师从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学习文献学。从此亲聆先生教诲十多年,得到先生学习、生活上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茫茫学海中,获名师指点而终生受益,实人生一大幸事也。先生治学主博通,研治四部各有佳作,而以文献学为根柢。我们首届研究生同学六人,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六人于博涉之外,各取一部古籍重点攻读。大约是早年喜爱三国人物与故事之故,且贪求简便,我选定的是《三国志》。对《三国志》诸版本的异同、文字训诂,刚开始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所以对全书篇目和内容比较

熟悉。这次所收论文,关于《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文章有四篇,便缘于此。后来,却由于《三国志》个别文字的考证,研究兴趣转到了经济史上,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对于我的“偏离文献”,先生不以为忤。先生的文献学,本不画地为牢,将人限定在文献整理和考订范围内,他是鼓励大家研究一些历史问题,提倡文献整理与研究相结合的。所以,我其后的硕士、博士论文以经济史为研究对象,先生是首肯的。

1990年之后,由所在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的工作性质所决定,我的精力主要放到了文献整理上。整理过程中有所感想,或为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因而有一些文献探索的文章发表出来。最近二十年中的文章,成为这次选编论文的主要来源。

选编出来的论文,大体上分为四组。第一组侧重于文献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对于“文献学”学科上的名目之争,我不拟卷入,却希望在“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现有框架内加以建设,故有《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学检论》两篇概论性文章。有感于古籍整理需要求真务实、高瞻远瞩的领导者,故有二文总结李一氓、周林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第二组是对张舜徽先生学术成就的总结。先生逝世后,我写过十多篇关于先生学术的文章,这次选了五篇。关于先生学术成果的分类与评述,《张舜徽先生的国学研究与重大贡献》一文代表了我较为成型认识。第三组文章侧重于几部古代名著和几位古代学者的探讨,《试论〈三国志〉的质直笔法》、《袁宏玄学化史论初探》或许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第四组皆为古籍序言、注译前言,卑之无甚高论。其中除首篇前言论及的《神仙传全译》外,其余各篇所涉及之古籍及注译,全由岳麓书社出版,倒是可见自己同岳麓

书社交往之久、缘分之深了。

几十年来文献学方面的文章主要就是这些,真有点令人汗颜。自忖学术起步在同龄人中不算晚,文献学上的成果应不止于此,却因途中笔耕不勤,所获寥寥。魏文帝“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之叹,恰似为我所发。不过,我并不悲观。《大戴礼记》有言:“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年近六十,当取斯语铭于座右。秉烛夜行,未为晚也。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001
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001
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学检论	017
关于古籍今译的几点思考	039
李一氓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	061
周林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	075
张舜徽先生的国学研究与重大贡献	089
《清人笔记条辨》所见张舜徽先生之治学观	127
张舜徽先生之纂辑观及其实践	159
张舜徽先生拟议编撰之作缀述	177
居延出土部分无纪年汉简书写年代的探讨	189
陈寿对文质辨洽风格的执著追求	203
试论《三国志》的质直笔法	219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	237
简论裴松之的考史原则与方法	251
袁宏玄学化史论初探	259
苏颂对古籍整理的贡献	277

《神仙传全译》前言	289
《大唐西域记》注译前言	303
《白话资治通鉴》前言	309
《宋书》校点前言	319
《南齐书》校点前言	329
《梁书》《陈书》校点前言	337
《南史》校点前言	345

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学科建立的重要性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自古以来,历代官府、士人都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编纂、整理和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几千年中文献典籍种类之繁多,数量之巨大,堪称世界之最。然而,将整理与研究历史文献的这门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却很短暂,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学界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对其意义所在,人们似乎未深入考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将愈加为人们所充分认识。

历史文献学地位的确立,是整个历史学学科体系逐步完善的标志之一。从事史学研究,得从文献整理工作入手,这是毋庸置疑的。拿版本来讲,各种版本之间的差异,有时往往影响到重大的史实,不可不讲究、不重视。就具体的文献记载而言,不确切的要考辨,漏载的要补充,错误的更要纠正。早在几千年前,针对周人伐商“恭行天罚”的传闻与记载,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矣,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①孟子也对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的记载表示怀疑:“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血之流杵也?”因此,他的态度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②这是

①《论语·子张篇》,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2532页。

②《孟子·尽心下》,《十三经注疏》本,第2773页。

从具体事例,说明文献考辨的必要性。更为要紧的,是要对各种相关文献融会贯通,弄清楚各种文献的来龙去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理出头绪来。这都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历史文献的搜集、编纂以至印刷、传播,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值得探讨,以丰富历史的内涵。因此,将历史文献学确定为一门学科,对完善历史学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历史文献学地位的确立,还是中国现代历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如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前,即“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此前十七年中,历史研究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受“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影响,受“影射史学”影响,几十年中真正有创见的著述不多,而贫乏空疏之作却随处可见。这且不论,即使在一些素养较深的学者心目中,似乎只有寻找历史规律、探讨重大历史问题才是从事历史研究,而文献整理与研究则不值得一提。对于整日同古代文献打交道者,他人称之为“钻故纸堆”,搞“烦琐考据”,认为那是在走封建学者的老路。这样,从事文献学研究工作的人,就被排斥在学术主潮之外,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学术成果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其结果,只会造成对历史学成果科学性的损伤。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在饱受“左倾”思想侵蚀之苦后,痛定思痛,才深刻认识到忽视文献学基础工作的错误,转而将其列入历史学科体系内,重点加以建设。因此,历史文献学的门类确立,取得与断代史、专门史等量齐观的地位,标示着中国现代历史学已经从“左倾”思想的干扰下走出来,迈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学科定义的确定性

历史文献学的地位确立后,对其定义的确立成为一时人们讨论的热点。

在确立历史文献学学科地位的过程中,张舜徽先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他关于学科的定义,是前有所承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过:“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①张舜徽先生在探讨文献学定义时,发挥了这段话中的思想。他强调文献学是“广义的史学”,认为文献学要整理与研究并重。“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②

学科确立之初,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者,影响较大的是白寿彝先生。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谈历史文献学》、《再谈历史文献学》二文。前文中,白先生讨论学科意义时指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1册专集第75种,中华书局,1989年。

^②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4页。

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①他特别指出:“历史文献指的是历史文献的本身,历史文献学是指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②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内容,他在《再谈》中以为可以包括为四个部分,即理论、历史、分类学、应用四部分(分类学是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③

其后,历史文献学理论的研究逐渐展开,并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著述。王余光先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是较早问世的一部。该书在讨论学科定义时说:“历史文献学是一门专科文献学,它的研究范围同文献学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④而“文献学是以文献整理的各方面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⑤。稍后问世的著述,当推张家璠和黄宝权、杨燕起和高国抗先生分别担任主编的同名著作《中国历史文献学》。前者在书中是这样给历史文献学下定义的:“要想全面掌握并正确运用我国历史文献,就必须了解历史文献发展的历史,必须掌握有关历史文献的积聚、分类、目录、版本、校勘、考证、辨伪、辑佚、标点、注释、今译、典藏、阅读以及检索的理论与方法。凡此种种,要求我们必须认

①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476页。

②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84页。

③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522~523页。

④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⑤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第19页。

真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学问,而这门学问,便是中国历史文献学。”^①这段话,是从内容来确定学科定义的。后者关于学科的定义,则阐述得更为简要:“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它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任务是为各种文化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而信实的资料,特别是在搜集、鉴别史料方面,能为历史学建立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工作的运用历史文献,创设着良好的条件。”^②

20世纪90年代末,谢玉杰、王继光二先生也主编了一部《中国历史文献学》,书中先对文献学作如下界说:“以一切文献为对象,主要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型、整理利用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谓之文献学。”在此基础上,认定历史文献学学科是“专科的‘中国历史学文献学’”^③。

进入新的世纪,则有曾贻芬、崔文印二先生合著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中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④。又从特点上强调,“历史文献学的确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任何运作,都必须是有有关分支的交叉运用和相互配合”^⑤。

从简要的回顾可见,几十年来围绕学科定义的讨论,从未间断过。

① 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② 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页。

③ 谢玉杰、王继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④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⑤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第4页。

各种界定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这显示出要对一门学科下确切的定义难度很大。目前,大致上正处于“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不妨求大同,存小异,在不太确切的定义下,来从事共同的事业。其大同者,在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文献本身,即历史文献的搜集与编纂、内容与著录、收藏与传播。如果涉及文献与史实的关系,也仅侧重于历史的事实性认识一方面(另一方面为规律性认识)。如果这个认识大体符合学术界现状,我们也不妨给历史文献学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即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本身加以整理、揭示和研究的一门学科,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这一定义有些模糊,仍然会不尽人意。不过,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属于历史文献学范畴,明眼人一看便知。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不像断代史、专门史的界限那样分明,或许它的定义就是在模糊性、宽泛性中显示出自己的确定性来的。而这种适度的模糊性与宽泛性,也可使一些学者的研究展示出自己的特色,使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形态更为丰富多彩。

顺便提到,目前不少学者希望将学科建设中的“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合而为一,建立统一的“文献学”或“中国文献学”学科。这个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在当前的学术管理机制下必有诸多不便之处,难以付诸实施。倒是原本分属两个学科的学者,可以互相交流,探讨共同性的问题,在思想上、方法上取长补短,深化对传统典籍与文化的认识。不要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比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地搞学科合并,效用可能更明显一些。

三、研究领域的开放性

对于文献学的研究范围,过去数十年中不断有人进行探索。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的,是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二人合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书前的《例言》中,援引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关于“文献”一词的解释后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刷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就全书内容看,涉及古籍的分类目录、点校整理、经籍传授、编纂、版本和刻印源流等问题,实际上包括了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全书篇幅不大,意义却不小。郑一奇先生在这一部书的《导读》中指出:“这是一部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对中国文献学的世界价值、地位重新审视的创新之作。”^①

在教学活动中,王欣夫先生编写了一部《文献学讲义》,他在《绪言》中强调“文献学的三个内容”,他阐述说:“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于是,他将文献学课程的内容确定为目录、版本、校雠三个方面。^②其后,罗孟祯先生所著《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也是同一路

①郑一奇《中国文献学概要导读》,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文献学概要》卷首。

②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数。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是应历史文献学学科诞生而撰作的。他认为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应该很开阔，目录、版本、校勘之外，还有辨伪、辑佚诸项，整理之外，还有文献的研究，并把编写通史列为文献学的目标。白寿彝先生围绕历史文献本身来谈研究领域，他最后成型的看法，是历史文献学包括前述四个部分，而其历史部分，“历史文献学所关心的是书写工具的发展，保管和传播的发展，著录和考订的发展等”^①。这就是说，书籍形态及其典藏，也应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事实上，年代学、避讳学是比较具体、实用的专门知识，与历史文献紧密相关，也应在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以上所述偏重于研究领域的理论部分，越到后来，人们看到的范围越大，体现了开放性的特点。说到开放性，更在历史文献内容的扩展上。这可以从时、空两方面讲。

20世纪以来，随着甲骨文、金文的发掘与研究，历史文献的内容大为丰富，使信史推至商代。每次大规模的甲骨金文的出土，都引起文献学领域的震撼。胡厚宣先生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合集》，已经成为商周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而在过去文献资料已经相当丰富的时段里，也由于出土文献的问世，增添了不少新的研究对象和课题。不断发掘出来的简牍、文书，经过整理，已经形成为简牍学、敦煌学。像20世纪末期间世的郭店楚简，使思想史的研究者如获至宝。而其基础工作，是文字的释读和文献的解说，这属于历史文献学范围。这些，都使古代文献更

^①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531页。